

他

人

的

血



西蒙娜·德·波伏娃 / 著
葛雷 齐彦芬 /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他

人

的

血

西蒙娜·德·波伏娃 / 著

葛雷 齐彦芬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人的血 / (法) 波伏娃著; 葛雷, 齐彦芬译.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7
ISBN 7 - 5068 - 0706 - 8

I. 他… II. ①波… ②葛… ③齐… III. 长篇小说 — 法
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1174 号

书 名 / 他人的血

书 号 / ISBN7 - 5068 - 0706 - 8/I·56

责任编辑 / 郝 捷

责任校对 / 时 速

责任印制 / 王大军 刘颖丽

封面设计 / 北京夸菲特艺术设计事务所

内文设计 / 高 湛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 (010) 63455164 (总编室) (010) 63454858 (发行部)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8.75 印张 215 千字

版 次 /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 2001—5000 册

定 价 / 15.00 元(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本 序

一部文学作品的命运是由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决定的，而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又是通过时代的需要来体现的。因此，我们判断文学作品的依据只有在它所经历的时代里去寻找；只有通过研究它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判断作家的创造，才能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时代的产物。

波伏娃的小说《他人的血》于1945年9月出版后，引起法国文坛的轰动，两年内再版了32次。该小说受到读者的如此欢迎，不是由于它像某些爱情、侦探小说那样，有什么刺激性的东西，而在于它以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

谱写了一曲时代的壮歌。

这部小说是以抗战为题材的存在主义小说。它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方面由其艺术价值所决定；另一方面，与战后存在主义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因此，评价这部小说，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阐述对存在主义的认识和评价，笔者就这一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

“存在主义”在我国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有人肯定它，有人否定它。但无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说明它在我国的读者中，已是一个“存在”了。既然是一个“存在”，就有认识的必要，肯定或者否定的前提是了解，是不带任何偏见的了解。研究一个问题的基本而可靠的方法，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去分析和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离开存在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代气候、文化土壤等条件来谈存在主义，恐怕很难对存在主义有正确的认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特就写了一部小说《恶心》。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作。萨特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强烈恶心感。如果把这种恶心感，放到法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去观察，便会发现，萨特的恶心感和他以前的法国作家们有着明显的联系。可以说它是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反映在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等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到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的作品中已转变为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恶之花》里所揭示的罪恶，污浊社会的阴暗角落，实在令人作呕；福楼拜就明确宣称：“我的写作目的‘是向我的同代人呕出他们所引起的我的厌恶，我终于要说出我的想法，喷出我的怨愤，吐出我的仇恨，咯出我的痛苦，清除我胸中

的愤懑……’。”^① 萨特对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两位作家是相当重视的，他不仅写过有关这两位作家的专著，而且在其他论著中也多次提到这两位作家。所以，萨特的恶心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人欲横流、道德沉沦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作家身上引起的一种强烈感觉和情绪。

真正奠定存在主义基础的是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从这部作品繁复深奥的哲学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实际是在强调人的价值，是在生灵涂炭、浩劫临头的情势下，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呼吁。有关《存在与虚无》命题的讨论，西方学者已有不少论著^②，但我们认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命题是从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中借来的。黑格尔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在存在和虚无之间的中间状态。”^③ 萨特在这里把“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哲学范畴来加以研究，强调人生是一个由存在到虚无的过程，但人的价值在于它区别于任何物，它是一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自觉创造自己和自觉走向虚无的一种特殊存在。萨特在自己的哲学中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对自己选择后的行动负责”以及“自我超越”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围绕的一个中心是：“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上帝，也不是由神仙来决定，而是完全决定于自己，你要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你就应该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主义的唯一信仰是“相信自己”。从我们的认识来看，这显然

① 引自莫泊桑《见闻录》法文版三卷集。

② 美国学者 D·麦克埃尔罗伊在他的论著《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学》中说，萨特的命题是来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本体论哲学的三条原理之一：“一切事物不可能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点牵强。

③ 黑格尔《逻辑学》，卷一《存在论》。

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在战乱和社会的沉沦中大多数西方人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而必须和可能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毁灭了西方教徒心目中神圣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不能拯救他们），也瓦解了一般人的价值观念（因为以往任何说教和堂皇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血淋淋的现实比任何东西都更现实。相对地说，“相信自己”是在混乱世界之中的一种清醒意识。萨特说：“失望并不是希望的反义词。失望就是相信我的根本目的不能达到……在写《存在与虚无》一书时，我是把失望看成是对人类处境的一种清醒认识。”^① 西方文艺评论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绝望中的希望。说它是绝望的，因为它确信所有价值都被摧毁了；说它是希望，它确信关键在于创造一种价值的新秩序。”^② 所以有人说：存在主义是一种新人道主义。这种思想恰好适应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些青年被世界大战所扰乱，被世界的荒诞所刺激，因人世的虚伪而厌烦。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席卷法国、遍及世界，决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存在主义是受到战争破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是带着灵魂创伤的西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对存在主义的争议之一，是存在主义理论中的“自由选择”问题。有人说，“自由选择”意味着为所欲为。不可否认，存在主义关于自由选择的理论，没有明确强调应该作正确选择，它所强调的只是选择还是不选择、自觉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的问题。“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也是

① 《萨特与莱维的对话》，载法国《新观察》杂志（1980年第800期）。

②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法国文学》（法文版），雅克·贝萨尼等著。

一种不选择的选择……由此产生了自由的荒诞性。”^① 因此，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处世态度，而不包含道德教训。针对这一理论的含混，卢卡契曾批评萨特是介于理想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萨特也谈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问题，并用“假如我发动战争，我就深刻地负有战争的责任”，婉转地对当时发起战争的法西斯提出了谴责，但我们还是感到这种态度是含混和无力的。然而，说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是为所欲为也是一种曲解。萨特所强调的自由选择，是强调了人对自我价值的清醒意识，它否定任何上帝、命运以及权威，反对任何决定论。不难看出，这是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讨人权、争生存的思想。按萨特的想法，即使争不到这种权力，至少自己应该把自己看作人，像一个人一样地去生活，去斗争。萨特多次强调指出：“自我并不是一种既定的现实，而是一种寻求的现实。”^② 为了寻找自我，不必向后看，而需向前看。“忠于自我并不是忠于一个物，甚至不是忠于自己的过去，而是越过整个物和整个过去，忠于一种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实的、向自我展开一种崭新未来的确切蓝图。”^③ 人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计划。萨特的几乎全部文学作品和波伏娃 50 年代以前的小说均明显地反映着这种思想。我们不接受存在主义的人生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但我们也不可否定存在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当时当地的法国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否定了这些，就不是一个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要对它作出公正的评价。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法文版第 561 页。

② 萨特《论存在》，法文版第 149 页。

③ 萨特《纳尔西斯的错误》，法文版第 132 页。

二

波伏娃的《他人的血》，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很好地体现了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思想。

《他人的血》围绕着青年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展开主题，并把青年人放在最严峻的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这就使这种选择更加庄严和不平凡。围绕着这一主题思想，作者集中塑造了两个典型人物：让·布劳马和海伦。

让·布劳马走过的人生道路是充满着曲折和坎坷的，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奋发斗争、充满进取心的道路。他是一个富有的印刷厂主的儿子，父亲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家庭物质条件优厚。布劳马从小受到母亲的溺爱，但长大成人后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去街上高唱“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们为“没有战争，没有失业，没有劳役，没有贫困”而斗争。同时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在一次集会中和警察发生冲突，被警察拘留，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制止他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在共产党和家庭之间进行了选择，决定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斗争，决心和剥削阶级家庭决裂，严格要求自己和其他工人一样自食其力。他先是当学徒，后来离家出走，到父亲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当工人，工作之余参加共产党人的集会和种种社会活动。与此同时，他说服了他的一位挚友、马塞尔的弟弟雅克和他一起参加政治集会。在一次集会时，与会者因观点不一致而发生殴斗，他的朋友雅克遇弹身亡。布劳马非常伤心，对政治活动心灰意冷，决心以后不再参预政治，并退出了共产党，以后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采取和平主义态度。他打算以后做些踏踏实实的福利工作，后来成为一个工会团体的领导人。为了改善二人的贫困生活，要求增加工资，他和其他工会团体联合，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这时，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奥地利，并准备侵占捷克。奥地利社会活动家到法国来要求支援奥地利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并在法国掀起反法西斯的工人运动。但是布劳马对政治保持疏远态度，以“不想把自己的祖国推向战争”为借口，拒绝了奥地利社会活动家的要求，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为袖手旁观。不久德国侵占了捷克，继续向前推进，战祸终于降临到了法兰西的头上。布劳马终于醒悟过来，对政治保持疏远是不可能的，不介入实际上是另一种态度的介入。他应征入伍，开赴前线，做了一名在战壕里摸爬滚打的普通士兵。他的未婚妻海伦认为与其英雄地死去，不如浑浑噩噩地活着，保持卿卿我我的恩爱。于是用“走后门”的方法，通过空军司令的关系，背着布劳马将他从前线调回后方的巴黎。布劳马认为在这样严酷的岁月里，让别人在前线流血牺牲、自己在后方过苟且偷安的生活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对海伦的作为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和海伦断绝关系并毅然再次奔赴前线，英勇奋战，打击德国侵略者。在一次战斗中他光荣负伤，伤愈后复员回巴黎。这时，法军已全线崩溃，法国政府向德军投降，巴黎和整个法国全部被德国占领。在德军占领的白色恐怖中，布劳马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串联，联合各有关团体和朋友，组织了地下抵抗组织，袭击盖世太保，搅得德国人坐卧不安。后来他的父亲和未婚妻都加入了他的组织，团结一致，同德国侵略者进行不屈的斗争。一次，他的未婚妻在营救一名共产党员的战斗中，不幸饮弹身亡，但这并未动摇他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他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采取了新的行动，投入了新的战斗。小说写到他的未婚妻海伦被救回来时已奄奄一息，布劳马向海伦检讨自己的错误，说是他不应该让她去，让她冒生命危险。海伦却说：“在他的命运里，你永远只是一个工具。人们不会从外部侵犯一种自由的半根毫毛，是我想要我死的。”于是布劳马总结出：“每一个人都有权

走自己的路，如果它是通向有价值的目标。”^①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海伦，她的一生是短暂而充满曲折的。她在自己的前半生里走过弯路，误入歧途。但后来在布劳马的帮助和影响下，终于选择了壮丽的人生道路。

海伦是一个性格复杂、心灵手巧的姑娘。她是商店的售货员，但画得一手好画，她的画为画商赚了不少钱。她对平淡生活感到枯燥和乏味。起先她和保尔相爱，保尔是个干什么事都一本正经、性情古板的人，他是个共产党员，动不动就爱用共产党人用的政治名词，把海伦叫做“小资产阶级”，这使海伦很反感。一天海伦在她营业的商店旁发现了一辆蓝色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一个富人的，在这里放了好几天，也没人管。海伦非常喜欢，想把它占为己有。她自己偷车又怕被别人发现，于是就跑到一家饭店找保尔，她知道这时保尔正和布劳马开会。不巧，保尔还没有来，只有布劳马一个人在等，于是她撒谎说自己有一辆自行车，叫布劳马帮着推到饭店来。布劳马欣然允诺，把自行车推来，正好这时保尔来了，发现海伦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坚决制止她。保尔坚持让海伦把车还回去，他认为这是可耻的偷窃行为，是卑鄙的做法；海伦则认为拿富人的东西是理所当然，不叫偷窃。经过布劳马的调解，这场风波才平息了下去。自从海伦认识了布劳马以后，她觉得他为人诚恳，满肚子学问，同时知道他讲革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口头的，因为她知道他和家庭脱离了关系，于是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她三番五次找布劳马聊天，想交换对人生的看法，布劳马感到海伦对自己的感情有点不正常，断然拒绝了和海伦交谈。海伦看出布劳马对自己如此谨慎和回避，是出于对保尔的友谊。于是她和保尔断绝了关系，在保尔和布劳马之间，海伦决然地选择了布劳马。但海伦把和保尔断绝关系的事告诉布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法文版第620页。

劳马以后，仍遭到布劳马的冷淡拒绝。为了向布劳马报复，海伦一气之下和一个流氓睡了一夜，后来海伦怀了孕，在朋友的帮助下，海伦经受了打胎的痛苦。布劳马知道了海伦的痛苦是由于他而造成的，产生了怜悯之情，并感到很抱歉，于是接受了海伦的爱，和海伦建立了爱情关系。海伦得到布劳马的爱情之后，沉湎在幸福之中。不料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布劳马应征入伍上了前线。海伦低声下气，求关系，找门路，给布劳马找到了一个调往后方的机会。她千里迢迢去前线看布劳马，并把此事告诉他，本来以为他会同意的，不料遭到了布劳马的拒绝。返回巴黎后，她不顾布劳马的反对强行把布劳马调回巴黎。布劳马大为恼火，感到海伦和自己格格不入，从此和海伦断绝了关系。德军逼近了巴黎，海伦随着逃难人群南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久法国投降，海伦又重返巴黎，在巴黎认识了一位德国军官贝格曼，并决心跟贝格曼去柏林过活，她和德国军官一起用餐，一起跳舞，完全丧失了一个法国人应有的尊严。但是，目睹德国法西斯的兽行，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海伦终于受到教育，感到震惊。海伦第一次感到震惊，是一次她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工程师因破坏德军设施而被枪毙的布告，她想到这位法国工程师的被害，肯定是由贝格曼之流决定的。想不到这个表面温文尔雅的人，竟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第二次震惊，是她的朋友德妮兹的丈夫马塞尔被德军俘虏关进集中营，德妮兹求海伦托贝格曼帮忙将马塞尔释放，海伦去求贝格曼，而贝格曼却说：“所有法国人都是靠不住的朋友……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贝格曼的话引起海伦的沉思。她因而想到难道德国人在法国为所欲为，法国人在德国人铁蹄下呻吟也是历史的必然吗？最后一次震惊，是海伦目睹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害。德国人到处搜查、逮捕犹太人，并把孩子和大人分开来，分别送往波兰，在那里用毒气把他们毒死。海伦亲眼看到警察把一个叫“吕特”的

孩子硬从母亲怀里夺走，母亲那呼天抢地哀号的悲惨情景。（吕特的名字到海伦临死前还萦绕在她的心中，在她生命垂危的昏迷中，嘴里还在呼唤着吕特的名字。）在血的事实面前她终于觉醒了，她不仅和德国人决裂，拒绝去柏林，而且为了救助自己的朋友——犹太姑娘伊冯娜，她去找布劳马，当面向布劳马做了自我批评。她认识到和德国人斗争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靠组织的力量，她要求参加布劳马的组织。布劳马看到海伦的转变，十分欣慰，答应了海伦的请求，从此以后，他们又成了一对志同道合的情人。在这个组织内，海伦完成任务很出色，很勇敢。一次，为了营救保尔出集中营，海伦化装开车，和德妮兹一起执行任务，英勇顽强地救回了保尔，她却不幸被枪弹打穿了胸膛。这位倔强的姑娘出色地完成任务后被救回来时，已经气息奄奄了。在人生的道路上，绕过一个圈子以后，她终于为法兰西的解放事业、为挽救同胞脱离苦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布劳马和海伦的行动，用存在主义的术语说，就是经过了“自由选择”。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唯一能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存在物，人是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一个计划，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懦夫还是英雄，不是由上帝、也不是由任何别的什么人决定的，而是由自己作选择而决定的。选择的自由是巨大的，人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一个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人一经选择，便对其结果承担起责任。人的一生是充满自由选择的一生，也是对世界负有责任的一生，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人生就是如此。萨特说：“如果存在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

指他仅仅对自己本人负责，而是对所有人负责。”^①《他人的血》扉页上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每一个人在所有人面前都负有责任”，就表明了存在主义所讲的选择和责任，并不是孤立的、个人的，而是广泛的、带有社会性的。

波伏娃笔下的两个主人公让·布劳马和海伦是自由选择英雄。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进行选择的自由，并充分利用这种自由进行选择，他们的选择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布劳马不甘心过纨绔子弟的生活，他选择了和自己的阶级决裂，加入了共产党；他不顾海伦拉后腿，毅然奔赴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前线。这一系列的选择都表明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作出的自由选择。这种正确的选择，在存在主义小说和戏剧中是很明显的。如萨特的小说《自由之路》中的马蒂约、戏剧《苍蝇》中奥莱斯特以及《死无葬身之地》中的一些人物，都是自由选择的英雄。

三

《他人的血》在表达存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萨特从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中总结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名言。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倾轧、互相排斥的一面。萨特强调的自由，也是个人孤立的自由，不是社会普遍的自由。总之，在世界上有了我的自由，就没有你的自由。关于存在主义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波伏娃的第一篇小说《女宾》算是表达得最生动、最深刻了。小说写一个剧院的负责人彼尔与他的同居夫人弗朗索瓦兹收养了外省来的一个贫穷少女萨维尔，企图组成一个“三位一

^①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载《外国文艺》1980年第5期。

体”的新家庭。但不多久，彼尔与萨维尔发生了暧昧关系，弗朗索瓦兹知道以后十分恼火。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她对萨维尔进行了报复。一方面她让彼尔隔着门缝窥视萨维尔和其未婚夫日尔拜吻抱，来离间彼尔与萨维尔的关系；另一方面她竭力引诱日尔拜上钩，使自己在情欲上占有日尔拜。这样，她便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萨维尔的面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两个男人上了战场，家里留下了一对势不两立的情敌。弗朗索瓦兹容不得萨维尔的存在，后来，在一个早晨，她乘萨维尔熟睡之机，打开煤气开关，下了毒手。在存在主义看来，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互相排斥、势不两立的关系。波伏娃用小说把这种关系戏剧化、形象化、具体化了。当然，对《女宾》的结尾波伏娃自己也是不满意的，她认为这样简单化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尽管小说中可以把对立面杀死，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波伏娃说：“《女宾》的结尾我是不满意的，凶杀是不能克服共同存在而孕育的困难的。我想不是回避这种困难，而是迎着这种困难而上。在《他人的血》中，在《毕鲁斯与西内亚斯》(1944)中，我力图确定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决定，我们要干预他人的命运，而且应该承担这种责任。但这种结论引起一种对立面：因为我尖锐地感到我负有责任，但我又不能做什么。”《女宾》过多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是从单层意思上展开的，是从直接和表面关系上来看问题的，充满着主观性和片面性。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这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他人的血》虽然也是表现人与人关系的一部小说，但《他人的血》中所表达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更有深度，甚至看问题的方法也有些辩证的意味了。这是波伏娃深入思索的结果。

《他人的血》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方面，展示出更深一层的内容。例如小说有这样一個很巧妙的情节，深刻地说明了这

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布劳马的地下组织袭击了德国盖世太保，用炸弹炸死德军八人，伤了多人。这使德军大为惊恐，为了报复，他们枪毙了十二个法国人质，并贴出告示，如果肇事者三天之内发现不了，另外十二个人质也要被枪毙。这二十四个人质与布劳马素昧平生，他们不知道、布劳马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行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布劳马是自首呢？还是忍心让十二名人质被枪毙？作者这样巧妙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尖锐的冲突，并以此来说明，不仅有直接关系的人之间是互相排斥的，即使毫无关系的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共存就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波伏娃没有再把这种对立孤立起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把这种对立统一了起来，为了祖国的命运和这个组织的前途，为了更好地同德国侵略者展开斗争，布劳马没有去自首，而是抵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下定决心，再次袭击盖世太保，狠狠打击侵略者。这里就显示了波伏娃的辩证观点：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团结一致、为更高的奋斗目标服务的一面。

小说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团结的这一面可说是表达得相当生动的。从波伏娃的角度看，这也正是对第一部小说《女宾》的补充和深化。如果说大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是一场浩劫，那么它的一个副产品却使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了。小说的前半部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后半部里得到了统一和解决；布劳马决心要与之划清界限的父亲，在同德国人的斗争中加入了布劳马的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和印刷条件；布劳马和共产党的抗战组织联合了起来，保尔和布劳马这对曾经是情敌的青年人也言归于好；被布劳马后来甩掉的情人马德莱娜也加入了布劳马的组织；海伦也不再那样放荡不羁，在组织里心悦诚服地完成任务；雅克的哥嫂马塞尔和德妮兹之间也不再闹矛盾，和睦共处，全心全意地执行任务；海伦甚至为营救保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等

等。他们团结一心，像爱护自己的领袖一样保护布劳马，听从他的指挥和安排，他们目标明确，信心百倍，没有懊丧，没有厌烦，没有任何怨言。布劳马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可以说上下一心，同心同德。波伏娃笔下的主人公布劳马对这一点十分明确：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用他人的血来换取祖国的解放是必要的。他在建立这个组织、准备向德国人采取暴力行动时就有人反对过，说这太危险了，德国人会报复的。这时在小说中布劳马有一段内心活动：“以前，他也曾梦想过通过响当当的理由来确保他的行动，但那就太容易了。必须进行无保障的行动，顾惜人的生命，比较一滴血和一滴泪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计较的，钱管用，他人的血也管用，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的。”为了使法兰西早日摆脱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他们万众一心，充满希望，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甚至为了他人的幸福，不惜自己的生命，唱出了壮丽人生的赞歌，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

四

波伏娃说：“我的第二部小说具有比第一部小说更多的艺术，它在表现人类关系方面具有更真实、更广阔的视野。”^①她又说：“从技巧上说，我有改革的印象，一部分人表示对我祝贺，另一部分人则抱怨故事经过了‘长长的隧道’才开展。但大家一致认为我找到了原始的形式，当时法国小说是那样尊重陈规陋习。使我更加吃惊的是我的小说‘充满血和生命’。一部书是合作的产物，读者的贡献和作者的贡献是相同的。然而我的小说像我一样陷入道德主义，我采用的观点对他们是那样自然，以致他们以为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法文版第323页。